

“乔丹”商标被判侵权是堂法治公开课

张枫逸 职员

12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对“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系列案件公开宣判。因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了迈克尔·杰弗里·乔丹对“乔丹”享有的在先姓名权,违反商标法规定,应予撤销。(12月8日《法制晚报》)

乔丹公司是我国福建省晋江市的一家体育用品生产商,该公司于上世纪90年代起先后注册了“乔丹”“QIADAN”等多个商标。2012年,迈克尔·乔丹以乔丹公司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其姓名权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争议商标的申请,但商评委裁定争议商标予以维持。随后,乔丹又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审维持裁定、上诉又被驳回的情况下,2015年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如今,随着最高法公开宣判,“乔丹”商标被判侵权应予撤销。这场持续4年的商标权之争终于画上一个句号。本案的终审宣判不仅具有个案价值,更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净化商标注册和使用环境具有普遍意义,给广大企业上了一堂法治公开课。

我国《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这种在先权利主要包括肖像权、姓名权、著作权、专利权等。与其他几种权利相比,人们对于姓名权的保护意识相对薄弱。由于名人的姓名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加之商标行政纠纷中涉及在先姓名权保护的标准和条件一直不明确,一些企业往往有意傍名人打“擦边球”。本案中,乔丹公司方面并不承认侵权,坚称“Jordan”在外国是一个普通的姓氏,中文包括拼音乔丹无法与迈克尔·乔丹建立

一一对应的关系。

根据《民法通则》,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现实中重名现象很常见,一般情况下各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姓名,也都是正当行使权利。不过,当某一自然人的姓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能够使社会公众将该名称与该自然人之间建立特定的联系,则该名称就应作为姓名权的客体受到保护。

乔丹虽然是个常见的姓氏,但对于公众来说,一提到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就是“飞人”乔丹。尤其将乔丹注册为体育用品商标,更会引发公众混淆误认。在上海、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询问“您认为迈克尔·乔丹与乔丹体育有关系吗?”至少七成受访者误以为迈克尔·乔丹是代言人或者存在其他联系。

在未经乔丹本人许可授权的情况下,乔丹公司擅自将“乔丹”申请注册为商标,对其姓名权造成损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无独有偶,近年来,周笔畅、腾格尔、易建联等名人姓名纷纷被抢注成商标,引发官司纠纷。“乔丹”商标一案具有重要的判例价值,不仅对于广大企业是有力警醒,对于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傍名人注册商标,虽然可以暂时“背靠大树好乘凉”,享用名人效应带来的品牌溢出价值,但在法治社会和知识产权时代,投机取巧终究是靠不住的。就拿乔丹公司来说,“乔丹体育民族品牌”的口号喊了多年,号称拥有上亿用户,“乔丹”商标被判撤销,无疑使得之前的品牌经营付之东流,这种教训值得广大企业引以为鉴。

错峰年休假可实现单位和旅游业双赢

龙继辉 职员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日前印发,其中提出,四川将围绕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目标,全面形成“五大旅游区域、十大旅游目的地、十大旅游精品线路”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意见》提出,四川要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切实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企业将安排职工旅游休闲作为奖励和福利措施。四川将鼓励错峰休假,探索弹性作息制度。(12月4日新华网)

说起风景如画的旅游景区,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跃跃欲试。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旅游也有“幸福的烦恼”。随着“五一黄金周”退出历史舞台,“十一黄金周”因成为万众宠爱于一身的“大众情人”而独木难撑,不堪重负,反而成为“黄金粥”“拥堵”“景区爆棚”“旅客滞留”等一系列苦不堪言的“代名词”,饱受游客的诟病。

“十一黄金周”一过,景区营业又跌至“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冰谷”。在国人偏爱凑热闹的习惯未发生根本改变之前,景区极大多数时间都在游客“用脚投票”的“抗议”声中“准打烊”。这样一来,人们放松身心的旅游冲动“被尘封”,因景区“黄金周”接待能力“瓶颈”只能限量准入,将大批游客拒之门外;“淡季”则因游客在“黄金周”吃了“闭门羹”而耿耿于怀,不愿“好就”而“惨淡经营”,导致景区维护升级常常难以维继。

造成这些不堪,不仅与假期过于集中有关,还与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有关。为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顾名思义,职工带薪年休假,不仅休假名正言顺了,更有“带薪(工资照发)”休假的红利。

但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会让原本人力就相形见绌的单位不愿执行,跟经济效益直接挂钩的企业更是不愿轻易“就范”。总的来说,带薪年休假制度在机关事业单位执行起来好于企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说下级在贯彻执行政策部署上大打折扣,然而,在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执行面前,不少企业甚至直接就是一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任性态度。所以,要让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不折不扣地执行,光有《意见》还不行,还必须让《意见》成为“带电高压线”,成为“长牙齿”的劳动保护法律法规,才能确保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全面执行。这就要求劳动监察部门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把机关企事业单位引导到年休假的良性循环轨道上。

错峰年休假可缓解“十一黄金周”拥挤不堪的状况。错峰年休假使游客错峰出行,源源不断地来到景区闲庭信步,从而使景区不会因游客的蜂拥而至而超负荷运行,而让游客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观赏美景。

错峰年休假要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必须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根据不同行业的业务高峰期和低谷期“因户施策”,做到两不误、两促进。比如,机关、事业单位可以集中在3、4月年休假,学校可以集中在1、7、8月年休假,企业可以根据行业经营旺季淡季的差别,选择在淡季年休假,有些在5、6月年休假,有些在9、10月休假。

此外,错峰年休假不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要“风水轮流转”,让带薪年休假的职工尽可能都能看到春夏秋冬四季如春的诗情画意。

总之,错峰年休假不仅可以让旅游业淡季不淡,旺季不堵,还可实现单位和旅游业双赢。

养老护理业“止血”须关爱加料

薛家明 职员

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老人护理的问题再次得到关注。据统计广州专业养老护理员缺口达15%,不少养老机构不得不靠实习生填补专业养老护理员的空缺。近日广州发文要求,护理员薪酬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但不少一线养老护理员在谈及薪资、晋升等问题时,都提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他们是专业的,而非“保姆”。(12月8日《羊城晚报》)

如果老人失去自理能力,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许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很多家庭就因为这个背上沉重的负担。而养老护理员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钥匙。养老护理员一方面可以协助儿女完成赡养老人的社会责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又能在老人的照顾上,提供更专业、更细致、更周到的服务,让老人在失去自理能力后,依然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可见缓解日趋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加大养老护理员培养力度刻不容缓。

然而尴尬的现实却是,养老护理员越来越稀缺。预计到2020年,全国将有超过4200万名失能老人。但养老护理员却出现极大的缺口。以广州为例,目前专业养老护理员缺口达15%,而且养老护理员以4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为主,老龄化严重。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未来养老护理员的缺口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何以出现养老护理员难求的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无非是两点:一是待遇偏低,二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据相关统计,目前平均每位养老护理员要照顾30多位老人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其劳动强度可见一斑。然而在收入上,养老护理员甚至还略逊于保姆。显然这样严重的付出与收入倒挂,很难留住养老护理员。

更重要的是,社会对养老护理员缺乏足够的尊重。在有些人眼里,养老护理员类似于保姆,只要肯出钱就一定找得到。基于这种傲慢的想法,让养老护理员尝尽世态炎凉。比如在积分落户、子女入学等政策上,被城市排斥在外。在公交卡办理等“小事”上,也倍受白眼。如果说待遇低剥夺了养老护理员的获得感,那么缺乏足够的尊重则让养老护理员更没有归宿感。独在异乡,却感受不到任何获得感和归宿感,谁还愿意留下来呢?

养老护理业“止血”须关爱加料。事实上,养老护理不仅是一项辛苦活,更是一项技术活,涉及很多专业知识。比如帮老人冲凉的水温、姿势怎样才合适,150多斤的老人怎样才能抱起来,情绪失控的老人如何安抚,等等。没有经过长期专业、系统化的培训,不仅起不到护理的作用,还可能适得其反。可见,养老护理业“止血”须关爱加料。只有给予更多关爱,让养老护理员成为一个抢手职业,才能真正体现他们的职业价值和社会认同,最终让我们的老年生活得以安放。

职称与外语分手更能激励创新

张全林 职员

昨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关于北京市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自2017年1月1日起,外语和计算机考试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这两项考试彻底与职称评审松绑。此项政策调整将涉及全市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12月2日《新京报》)

职称评审的游戏规则,久为公众诟病,在“唯外语”导向下催生的培训产业颇为发达,成为一大奇观。连职称评审者心里也清楚,考外语几乎都少不了金钱来铺路,因此富了一批培训公司。英语通过了仍然不认得英语的现象并非罕见,可见个中的玄机和无奈。会讲外语是不是专业能力的体现,作为职称晋级评审的依据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公众心里都明白。

职称是职业水平的标志,相应的职称意味着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高度。水平达到了,就应该认定其资质。如果从事的职业与外语无关,就不应该把外语无端牵涉进来。道理很简单,但实践中长期搞拉郎配,说到底还是思维方式陈旧,没有与时俱进。

如已经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技术创新,不算科研成果,能不能证明其职业

水平?答案不言自明。因为学术评价体系缺乏合理性,才导致假论文满天飞,外语培训产业热得烫手,而埋头干出实绩的人反倒职称升不上去。

职称评审绝非是一个封闭在象牙塔内的孤立系统,不同于鉴定一个只能用来把玩观赏的物件,惟有看职称申报者的真本事,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创造新的效益,才是衡量标准。那些外语过关式的奇葩评价,是办法老套,思想观念抱残守缺使然,并不利于激励社会创新热情。相反,为了职称过关而忙于奔波,穷于应付,倒是占去了不少可用于创新的精力和时间。

此弊病还在其次,最严重的危害是生发负面心理暗示,只要把无关紧要的弄好了,就能评上职称,谁还会动真格在业务上下功夫求精图提升。把不适当的条件引入职称评定体系,只会削弱人才创新的内在动力。

职称评审与外语捆绑的背后,反映出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成色,但也是一个人事考核体系问题。201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明定,考核工作人员的重点是考核工作绩效,强调考核应当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和评价。如教师服务的对象是学生,其考核应当听取学生的意见

和评价,这是法定程序。科研成果的终极价值,肯定体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这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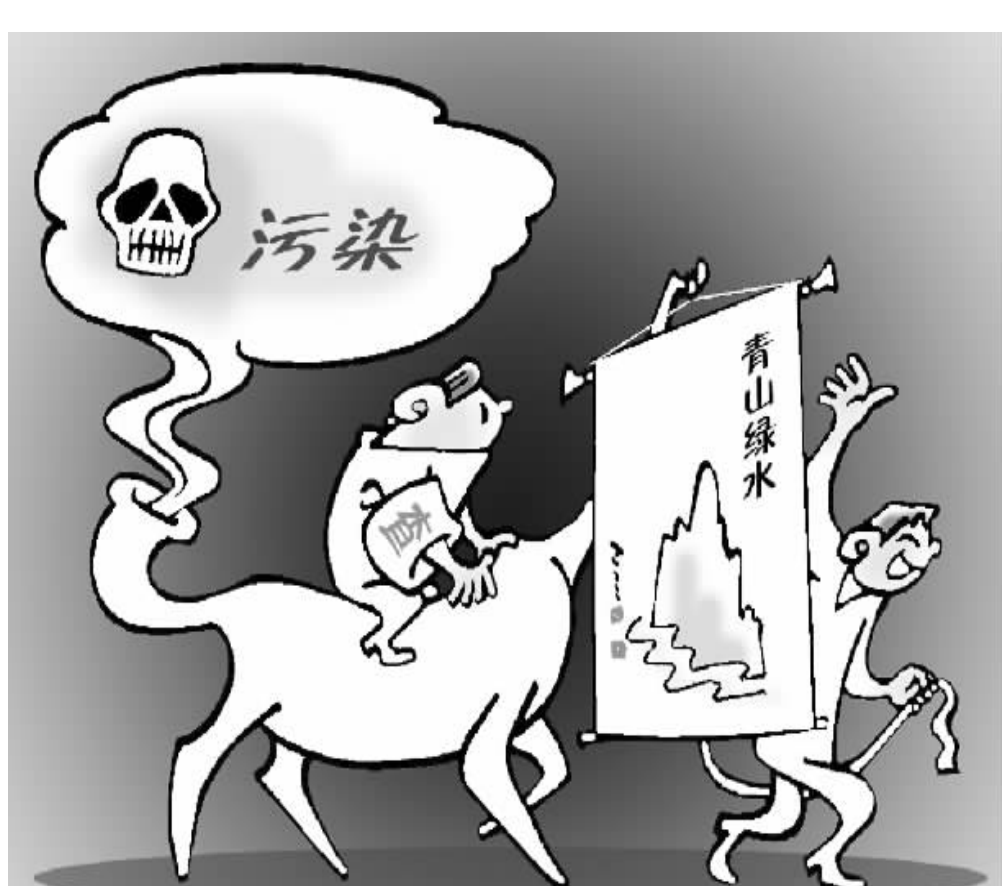
论文不够数、外语没通过、职称没法评的尴尬该打休止符了。改革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对论文、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再作统一要求,此事影响的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晋级,也事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支撑是否过硬。

北京市的通知明确提出,按照突出业绩、贡献和创新能力的职称评价导向,从2017年1月1日起,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由用人单位结合专业技术岗位需要,自主确定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聘任条件。职称与聘任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根据实际需要,看条件聘任,才合情合理。有了职称不一定就被聘任,如果被聘任,肯定要适应从业岗位的技能要求才能。

这样将强化用人单位在职称评价中的主导作用,由用人单位根据岗位需要,明确不同岗位聘任对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要求,对于从事与外语和计算机联系不甚紧密的人员来说,就没那么多烦恼了。把耗费在外语上的精力财力,用来投入创新,岂不更好。

戏画闲言

环保督查被瞒骗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调查发现,江西省九江市彭泽矾山工业园瞒骗中央环保督查,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你来我停,你走我生产”的方式,弄虚作假,糊弄督查,向天空排废气,向长江排污水。(12月4日央视网)

这些污染企业的老板们自以为聪明过人,凭着与当地政府部门中的某些官员拉扯下的各种关系,就可以同顾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大肆排污,破坏生态环境,祸害周边群众,而不受制裁。他们甚至敢于瞒骗中央环保督查,糊弄上级,采取“你来我停,你走我生产”的方式,与督查人员玩起了躲猫猫捉迷藏的游戏,打起了“游击战术”,千方百计地大排废气、大排污水。如此祸国殃民的行径,令人愤慨。有道是:

环保督查被瞒骗,胡作非为胆包天;对抗法规坑百姓,狂排污染祸无边。

看来,对于这伙明知故犯的排污企业老板,有关部门也该腰杆子硬起来,对他们坚决以环保法规伺候之,及时给予相应的惩治,不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肆排污遭殃地方损害群众。只有坚定地执行依法治国的方针,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清洁起来,人民的生活才会变得健康快乐起来。

报业口述史:我与厂长经理报的故事

上海会议背后的故事(二)

陈太明

“上海会议”差点夭折

我是提前一个月进入千鹤宾馆进行会议筹备的,同行的还有杨厚文、林学忠、童严珍。接着,会议票务组李震、张建忠等人来了,车辆调度组的胥平、负责协调的江允能等陆续进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报社举行会议除了有秘书组外,还有票务组、车辆调度组、餐饮组等,机构十分健全。为什么要有票务组呢?因为当时出差主要乘火车,而火车票特别紧张。开会的代表如果不事先做好返程计划,想临时买票返程几乎不可能。报社通过媒体

优势及其他关系,一般可以解决返程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票务组要有四个人的原因。为什么要有车辆调度组呢?那个时候报社开会,都要接送和送站。所需车辆一部分通过赞助,一部分租车。为什么要有餐饮组呢?因为企业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同时,到达会议地点的时间不一,有的可能错过吃饭时间,这时就需要专门有人为企业家提供服务。企业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没想到的,我们要为他们提前想到。分别负责上述三个组的历来都是李震、胥平和单小利。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议筹备很顺利。但突然出现的一个状况,差点使上海会议夭折。

3月10日左右,上海市台办来了两个人,他们听说上海会议邀请了台湾的企业家,他

们来问我们办了手续没有(注:我们事先没有邀请上海市台办,他们可能是通过我们发给上海市媒体的邀请函得知的)。

当时,我们都傻眼了。什么手续?我们问。他们说,你们的主管单位是哪一级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我们答道。那你们有没有四川省台办批准会议的文件?另外,主办单位之一还有经济日报社,还应该有国台办的文件。

我们说,我们这个会议是媒体办的一个海峡两岸企业家联谊会。我们强调说,只是一个联谊会,不涉及政治方面。

那也不行。上海台办的人说。至少要有一个台办的文件,国台办或者四川省台办都可以,会议才能举行。这是政策,他们强调说。

当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汪辜会谈”后,大陆和台湾方面的交流松动了许多,鼓励海峡两岸的民间加强交流。这是报社策划本次会议的焦点,也是吸引包括大陆企业家、台湾企业家、香港企业家700多人(其中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100多人)参会的热点。

上海台办的人临走时,特别警告说:如果没有台办的文件,会议必须停办。

当时在千鹤宾馆参加筹备的工作人员听说此事后,全都吓傻了。

于是,我赶紧向成都本部老总报告,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

3月15日,离会议举行还差三天,我们终于从宾馆的传真室等到了报社发来的传真,是四川省台办同意举行这次会议的文件。当时真有天降福音的感觉。

会议筹备组当即派我和李柏林到上海台办去。

我们给上海台办的负责人看了四川省台

办同意举行这次会议的文件后,他们说,你们可以举行会议,但我们上海台办不支持,不反对。如果出了事,我们会找你们的。

我们说,什么事也不会出,我们保证。如果临时有什么事,我们会及时向上海台办报告。

最后,我们还特地邀请上海台办参加会议,他们强调说,我们上海台办不支持,不反对。

幸好,上海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没有任何违规之处。

事后,我听说成都本部的领导在办理四川省台办的文件时,还颇费了一些周折。这当然是后话了。

报社初创时期,尽管也遇到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在团结一致、奋发努力的全体报人面前,总是能化险为夷;并且每次遭受的挫折总能激发全体报人更大的热情、坚忍不拔的信心,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上海会议的成功举办,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